

河南省志 新闻篇

(1898——1985)

(试 写 稿)

河南省新闻史志编辑室编纂

1987年3月

概 述

我国唐代即已出现邸报。北宋定都汴梁(开封),汴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新闻传播中心。由于印刷造纸业的发达和政府传达政令的需要,宋代邸报较之唐代邸报有了较大发展。北宋初年朝廷设立都进奏院,作为统一发布诏令,传递朝廷及各州郡间文书的机构,并统一编印发行邸报。内容包括朝廷政事、诏令、官吏任免、赏罚、章表等,其读者对象为官吏。北宋末年,邸报已有公开售卖。北宋末至南宋还出现有不拘于邸报内容的民营“小报”。以上是河南最早的古代报纸,但都未见实物。

及至清初,在京城北京出现了一种私人设立的报房,依据内阁阁钞刻印半官方出版物——《京报》。《京报》系由内廷特许刊行。其内容主要仍为皇帝谕旨、宫廷消息、重要官吏任免、群臣奏章等,类如政府公报。其形式为长方形的书册,以黄色土纸作封面,左上方印有“京报”二字,右下方印有报房名称。里面用竹纸木刻活字印刷,每册五六页至十余页不等。当时各省都有派驻京城的提塘官署,专司传递军报和本省与朝廷间的来往文书。久之事权变迁,提塘官成为可以世袭或私相授受的职务,专以推销或印行《京报》为业。由各省提塘印行的《京报》封面除京报二字外,还印有“省塘官署”或“省塘报局”字样。目前所见汴省塘报局刊行的《京报》,最早为清光绪三年(1877年)出版。清末开封担任提塘的,为满族人塞拉灰。因销售京报颇有积蓄,建宅地于相国寺后街西头,凡省垣订阅《京报》的均到该处。各县公署,则普遍驿递一份。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报纸印数有限,订阅办法分为留报与换报两种,并有头报、二报、三报的区别。换报者限看一天,不得留存。报纸先送给头报,次日送去新报,即将前送之报取回转给二报,依次再转给三报。订报价格也不等,二报较头报晚看一天,订价少三分之一;三报较头报晚看两天,订价少三分之二。留报者不论头、二、三报,均比换报的价格加倍。

戊戌年间(清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河南官书局出版有《汇报辑要》,内容主要选辑清廷官书局《汇报》,除上谕和奏折外,还有介绍国外情况的译文。形式仍仿京报式样。这是河南近代最早的官报,发行时间不长,戊戌变法失败,报亦停刊。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开始颁行新政,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在天津率先出版《北洋官报》,各省督抚纷纷效法,河南省则有光绪三十年(1904年)由巡抚陈夔龙创办的《河南官报》问世。其后并在南阳、卫辉、怀庆、彰德、孟县等处由地方集资开办阅报所,以资推广。继《河南官报》之后,又有河南学务公所创办之《开封简报》(1906年),《河南教育官报》(1907年)等报刊发行。在此期间虽有著名文人狄杏南创办《与舍学报》(1907年),开河南私人办报之先河,但其宗旨为宏扬国学,不合潮流,影响不大,旋即停刊。这一时期基本上为官报独占局面。

河南政党报纸的出现始于海外留学生创办的报刊。1907年,河南留日同盟会员筹资创办了《河南》杂志。《河南》抨击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的腐朽统治,宣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政治主张,号召武力推翻清廷,影响较大。该刊绝大部分运回国内发行,打

破了官报在河南的一统天下，给闭塞的中原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革命党人在开封还开办了《大河书社》作为《河南》及其它革命书报的发行机构，同时又是革命活动的秘密联络机关。《河南》仅发行九期，即被日本警察厅应清驻日使馆要求予以查封。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河南革命党人虽多次进行了起义的准备工作，终因反动势力之强大、革命党内部之不统一而宣告流产，河南成为全国少数几个未宣布独立的省份之一。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举国振奋，河南革命党人亦由地下秘密活动状态而公开，首先开设报馆，宣传革命主张。1912年春，先有同盟会河南支部的《大中民报》创刊。接着，国民党河南支部创办的《自由报》、《临时纪闻》、《开封民立报》等报先后发刊，彼伏此起，对袁世凯及河南都督张镇芳破坏约法、独裁专制的倒行逆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张镇芳则秉承袁世凯之命，残酷镇压河南的革命活动，将辛亥以后人民得到的一点点民主权利剥夺殆尽。《自由报》于1913年1月被张镇芳强行封闭，总编辑贾英被捕，后在各界群众的强大声援下才获释放。1913年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河南都督张镇芳在全省大肆捕杀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贾英被害于北京，成为河南为坚持共和、反对帝制而献身的第一位新闻战士。接着张镇芳又借口《开封民立报》与开封火药库爆炸一案有关而将该报查封，将编辑主任罗飞生等人逮捕杀害。

以上各报虽然发行时间都不长，多者半年，少者只两月余，但却是河南新闻事业长足进步的重要里程。不仅办报宗旨与清末迥然不同，报纸形式也不同于清末书册状报刊，而与现代报纸相接近，开始采用铅印机两面印刷，或日出对开四版一大张，或对开两大张。尤其政论时评锋芒犀利，言词激烈，引人注目，是这些报纸的一大特色。国民党报刊被禁绝后，政党报纸唯余依附袁世凯的统一党所办之《河声日报》（1921年），为袁氏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工商界为提倡实业而创办的《实业日报》（1913年）等民营报纸。出现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出版较早的两份晚报：《晚报》（1916年）和《河南晚报》（1916年）。其后有《新中州报》（1917年）是由中原煤矿公司负责人、河南名流胡石青、王抟沙所创办。此时郑州、安阳、信阳等地亦已出现报刊。《新中州报》因与北洋政府有多方面联系，又有公司的财力为后盾，所以该报出版十年之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六·三”以后，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镇压北京及各省区的学生运动。河南督军赵倜在严厉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摧残报业，箝制舆论，并且贿赂收买一些报纸，力图封锁消息。当时，在中等学校，凡批评政府的报刊均不准订阅，省会开封日销各报不及两千份。但许多青年学生组织进步社团，编印校刊、校报公开发行，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对推动河南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其中以青年学会编印的《青年》半月刊、心声杂志社出版的《心声》及洛阳出版的《河洛周刊》较为著名。

进入二十年代，河南成为新老军阀连年混战的大战场。中原战火不熄，时局动荡，兵员遍地，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新闻事业亦无从发展。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时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在革命高潮推动下，于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改所部为国民军。是年12月，国民军二军军长胡景翼进驻开封，任河南督办，建立了国民党河南省党部。冯、胡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先后邀请共产党人李大钊、王若飞和苏联代表、军事顾问来汴帮

助工作。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加强了在河南的工作。同年秋，共产党员肖楚女主办的《中州评论》在开封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刊物，是在河南宣传马列主义，指导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该刊后来成为中共豫陕区委的机关刊。国民党开封市党部出版了《河南青年》和《每周通讯》。时隔不久，冯玉祥在直奉军阀联合进逼下被迫“引退”，河南重陷直系军阀统治之下，两党刊物均停刊。

1927年初，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冯玉祥率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东出潼关进入河南。5月，北伐军与冯部会师开封，武汉国民党政府任冯为河南省主席，省政府创办了机关报《河南民报》。10月，第二集团军政治部创办了河南第一家军报——《革命军人朝报》。在革命高潮中，河南省共产党的地方组织纷纷建立，在基层党建中，不少县曾出版了油印刊物。如中共潢川支部的《潢川国民》、叶县支部的《晨鸡》、濮阳县支部的《白杨书札》、南阳特委的《唐河潮》等。7月，宁汉合流，国共分裂，全国革命进入低潮，冯玉祥在河南也开始反共“清党”，河南的共产党转入地下，组织屡遭破坏。1929年开始的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更将河南人民拖入灾难的深渊。历时七个月的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击溃冯几十万军队而告结束。1930年冬，刘峙出任河南省主席，标志着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此控制了河南。在驻马店创刊的国民党省党部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1930）随省党部由信阳进入开封，由石印改铅印大张出版。刘峙主持的河南省政府仍以《河南民报》作为机关报。隶属开封行营（后改豫皖绥靖公署）的和平通讯社、隶属省党部的河南通讯社也于1931年相继成立并发稿，和平通讯社同时还兼办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发稿事宜。

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时机。1930年鄂豫皖根据地初具规模。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省委分别出版有《列宁周报》、《鄂豫皖红旗》，苏维埃政府出有《苏维埃季刊》，共青团委有《共产主义ABC》，儿童团有《共产儿童》，部队有专门的刊物《战斗报》、《军事通讯》，红军后方医院还出有《显微镜报》等。这些针对不同读者对象出版的报刊，对于苏区的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都起了不小的作用。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对鄂豫皖苏区的连年围剿，有的报刊转移出版，有的被迫停刊。

1930年以后，河南国民党统治区内相对稳定，经济有所发展，不少县、市党部办起了铅印或石印报纸，如新乡县党部的《豫北日报》、郑州市党部的《郑州日报》、禹县县党部的《禹县日报》、潢川县党部的《豫南日报》、南阳县党部的《宛南民报》等。这些报纸的工作人员大多由县党部人员兼任，经费也主要来自县党部。此外，还相继出现一批民办报纸，形成了国民党报纸、民营报纸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根据地报刊与地下刊物三者并存的状态。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府颁布《出版法》等有关新闻出版法令，并开始实施新闻检查。因而苏区报刊只能在根据地内发行，地下党的报刊只能在极小范围秘密发行。

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洛阳，定洛阳为行都。洛阳一时成为全国新闻发布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在这一形势下，河南新闻事业呈现出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民主进步的报刊相继出现，其中有共产党领导的、在中原地区起了很大影响的《风雨》周刊，有一度在共产党控制下的民办报纸《行都日报》等；原有的一

些国民党报刊其言论也趋向进步。国民党的两大主要报纸——省党部的《河南民国日报》和省政府的《河南民报》，由于编辑部内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抗战初期都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随着开封、洛阳相继沦陷，两报辗转迁徙，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尚能坚持出版。但由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和报社人事的变动，两报的进步性亦随之消失而日趋反动。

革命根据地报刊在抗日烽火中有了新的发展。中共中原局在竹沟根据地创办了《小消息》报；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敌后，出发前创办了《拂晓报》；其后豫皖苏根据地内的鹿邑、永城、夏邑等县委出版有《动员小报》、《永光报》、《夏声报》等。在冀鲁豫根据地河南境内的地、县委几乎都办有报纸。《冀鲁豫日报》有时也转移到河南境内出版。这些报刊有如号角，对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动员民众坚持抗日救亡，起了中坚作用。

共产党领导下的根据地报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传统。这些报刊都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其宣传方针、报道内容服务于党在各时期的中心工作；言论占有重要位置；党的一些重要指示、文件、命令等常直接见诸报端。新闻方面则是侧重战争消息及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情况。报纸副刊也都紧密结合斗争实际，有较强的鼓动性。报纸十分重视发动群众、战士写稿、投稿，内容紧密联系实际，不登消闲性的文字，也没有广告。

在四周被敌人封锁分割的根据地和游击环境下办报，条件十分艰苦恶劣，加上物资贫乏，报纸很少铅印，多为油印或石印，所用纸张也以土纸居多。有时正在编印报纸，突然枪声四起，只得收起工具，随军转移，到宿营地又立即开始编报印报，所以报纸出版地点、时间无法固定。尽管如此，党的新闻工作者以顽强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报纸出版，尽一切努力提高报纸质量，甚至为之献出了生命。根据地报刊的发行方式，也是根据条件不断变换的。有的由报社人员自己发送，或由交通员带往各地，商城出版的《红日》，曾组织了一批少年儿童作为报纸的发行队伍。抗战后期，在根据地内，一般由邮局运送，军队系统通过军邮发行。

1937年11月安阳沦陷，1938年2月新乡失守，豫北大片国土沦丧。1938年6月，开封及豫东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日本占领军在沦陷区内推行强化治安，奴化教育。一些民族败类秉承日军意图在沦陷区各地出版了十余家汉奸报纸，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最主要的为开封出版的伪《新河南日报》。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原有的新闻检查制度，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战时新闻统制的法令、条规及实施办法，建立了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河南新闻检查处和市、县新闻检查室多处，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新闻检查网。国民党反共高潮之后，对舆论的箝制越发严格，河南境内不少报刊稿件被删改、扣压，报纸被停刊、查禁。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政党团等各方面人员纷纷赶往“收复区”，争相“劫收”，利用抢占的敌伪报社、印刷所，办起了一批新的报纸。在省会开封，除省政府的《河南民报》、省党部的《河南民国日报》均迁回复刊外，还有军统骨干分子接收伪《新河南日报》逆产创办的《力行日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系统接收日本居留民会《东亚新报》创办的《大河日报》；三青团系统接收《青锋日报》出版了《青年日报》；《民权新闻》也是接收敌

伪产业办起的报纸。加上其他民营报纸，1946年即有报社十余家之多，还有大大小小的新闻通讯社十余家，可谓盛极一时。郑州、洛阳、新乡、安阳、许昌、漯河等沿铁路市镇及各县城，也纷纷复刊和创刊了一批报纸、通讯社。全省报纸数量已达七八十家之多。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大后方新闻出版界拒绝检查的冲击下，国民党政府的战时新闻检查制度终告废止，新闻检查机构撤销。河南新闻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然而好景不常，旧政协决议即被撕毁，国民党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悍然发动内战，同时加紧绞杀言论自由，垄断控制新闻。地方党政军警宪特，随时均可干与新闻机构，扣压报纸、禁止派销、处罚停刊、逮捕记者、策划捣毁报社的事件均有发生。国民党特务、社会流氓公然厕身新闻队伍，进行监视、刺探、告密等活动。政治形势日益险恶，法西斯统治变本加厉。但仍有一些报纸和进步报人，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进行着艰难曲折的斗争。

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区的报纸和新闻工作者又一次经历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如1946年夏，当淮北津浦路西地区面临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时，《雪枫报》因笨重的印刷装备无法携带，只得将机器铅字埋藏地下，人员随军行动，在炮火中改出油印的《雪枫快报》。以后机器又被敌人扒走。1947年夏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雪枫报》作为中共豫皖苏区党委的机关报复刊时，仍为油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后，地主阶级拼命反抗，国民党军队和地主还乡团武装不断袭击。在反复拉锯的环境中，报纸编辑、记者往往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不但工作紧张，而且战斗频繁，生活十分艰苦。其它报纸情况亦类似。不少记者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

随着战争的胜利发展，解放区不断扩大，解放区的新闻事业也迅速发展。1947年冬解放许昌后，运回了缴获的大号圆盘铅印机，1948年4月《雪枫报》恢复了铅印。同一时间，豫西重镇洛阳再次解放，《新洛阳报》随之出版。中共豫西区党委1948年6月在鲁山成立后，又出版了《豫西日报》。1948年10月郑、汴解放，《郑州新闻》、《开封日报》相继创刊。年底，《桐柏日报》和《新宛西报》均由石印改为铅印，并于1949年3月合并成立《南阳日报》。1949年元旦，中共中央中原局的机关报《中原日报》在郑州创刊，是当时中原地区第一个铅印的对开大报。这些报纸的采运部，也是新华社的总分社、分社或支社。1949年6月1日，中共河南省委的机关报《河南日报》在开封创刊，新华社河南分社同时单独成立。

与此形成对照，国民党由于战争节节失利，其统治区不断缩小，交通阻断，纸张与印刷器材供应不继，报纸销路日减，篇幅缩小。新闻事业日益萎缩，最后终告覆灭。省会开封的各大报，1947年即由对开四版缩为四开两版，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后，有的又由四开变为八开，有的两报合出一报，最后大多纷纷变卖器材逃跑。其它各城市县镇的报纸，也大多在当地解放前停刊。

建国后的河南新闻事业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报纸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所有的报纸都已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共产党联系全省人民的重要纽带，它在宣传政策、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推动工作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早在建国前夕，中共河南省委根据全省已经统一、铁路交通日趋便利的有利条件，和当时人财物力均属有限的状况，对全省报纸的出版作了调整，以便有计划有重点地首先办好几个报纸。随着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省委机关报《河南日报》为中心，

辅以全省性的通俗报纸《河南大众》报，郑、汴、洛三个市委机关报，以及《南阳日报》（南阳地委机关报）、《豫南人民报》（潢川、信阳两地委合办）、加上个别的企业报这样一种报纸布局。这些报纸把老解放区的办报经验与全国、全省解放的新形势相结合，对建国初期的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恢复国民经济、互助合作化运动、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在河南的重点项目等，都作了大量有效的宣传，贯彻了报纸工作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针，发扬了无产阶级报刊的优良传统。

为了适应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新形势，改进和提高报纸工作，全省新闻界于五十年代初期开展了学习苏联报纸经验的活动，从中学到了一些有益经验，但也存在着照搬苏联报纸经验和模式的缺点，带来一些弊病。因此，在1956年农业、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行将完成的情况下，进一步改进报纸工作又提到了党的日程上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参照《人民日报》的经验，以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自由讨论和改进文风，作为改进当时报纸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此后左倾思想的发展，使这次改进报纸工作未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在1957年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中，河南新闻界开展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办报路线的斗争，把坚决依靠党委领导、突出中心工作宣传和报纸群众工作的阶级路线，作为无产阶级办报路线的基本内容。但在当时情况下，一些业务问题、学术思想被当作政治问题批判，对具体工作的某些意见被上纲为“反党”，结果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错误，给新闻队伍和报纸工作造成了损害，并且使指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盲目性。当1958年“大跃进”的浪潮到来时，新闻工作者由于分不清政治指导上“左倾蛮干”和实事求是的区别，以热情代替科学，致使报纸的宣传报道在较长时间内出现了严重浮夸和主观片面的错误，鼓吹高指标、高产量，放出了许多假“卫星”，这些错误又反过来对实际工作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如此，在“大跃进”中新闻工作者表现出的高度革命热情，对群众首创精神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尊重，以及雷厉风行、讲求时效、全力以赴的作风，仍然弥足珍贵。报纸业务的言论、编辑、采访、版面等工作，都得到锻炼而有改进和提高。报纸销量剧增，超过了建国前报纸销量的几十倍；印刷开始采用高速轮转机。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报纸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强调实事求是，提倡调查研究，并开展了新闻业务的基本功训练，使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在此期间，河南的新闻事业还出现过大起大落的现象。从1956年兴起办报热潮至1959年的两年多，不但各地委、市委、省级一些群众团体、各大型厂矿企业都有了自己的报纸，而且县县办报纸，使全省县级以上的报纸迅速发展132种，期印数达220多万份，明显超过了当时河南经济基础的承受能力。因而当国民经济一旦出现暂时困难，这些报纸便不得不被迫大量下马。以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一些城市报纸也陆续复刊。1963年，建国后河南的第一家晚报——《郑州晚报》在原来《郑州日报》的基础上创刊。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篡夺了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权。当时全省报纸纷纷遭冲击停刊，广大新闻工作者受到打击迫害，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破坏殆尽，许多理论原则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报纸在群众中的威信空前低落。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河南的新闻工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也是建国以来

最好的时期。通过全党拨乱反正，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新闻观点，假、大、空流毒和多年来“左”的影响，逐步恢复和发扬了报纸工作的好传统，许多报纸复刊，又创办了许多新的报纸。截止1985年底，“文化革命”后复刊和新办的地、市党报达到14家，各种专业报纸发展到31家，企业报32家，校报6家，在全省形成了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品种、多层次的报纸网。知识分子政策在新闻单位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步落实。新闻改革不断取得进展。办报指导思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新闻报道在新、短、快、广、针对性强等方面有很大进步；报纸的信息量增多，知识性、服务性、可读性都有所加强；报纸内容和版面趋向生动活泼，一些报纸篇幅扩大；采访、电讯、印刷手段和经营管理均在改善；新闻团体纷纷建立；新闻研究、新闻教育和对外交往有明显的发展和加强，新闻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有所提高。经过曲折的道路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全省新闻事业正走向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河南近现代报刊的发展，上起1898年，下至1985年，共历时88年。

目 录

概 述

第一章 报刊

第一节 官报	(1)
第二节 党派报纸	(5)
第三节 民办报纸	(31)
第四节 军报	(46)
第五节 专业报	(49)
第六节 企业报	(51)
第七节 时事性期刊	(53)
第八节 其它	(56)

附：河南各时期报刊一览表

第二章 通讯社

第一节 河南地方通讯社	(78)
第二节 驻豫通讯社	(80)

附：外埠报驻豫记者特约通讯员表

中央各报驻豫记者站及人员表

河南各时期通讯社一览表

第三章 新闻业务

第一节 编辑业务	(89)
第二节 记者工作	(119)
第三节 通联工作	(124)
第四节 新闻业务建设和新闻研究	(129)

第四章 新闻管理

第一节 清末至建国前主要新闻法规及其在河南的实施	(136)
第二节 人民政府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和领导	(146)

第五章 新闻团体

第一节 新闻团体简介	(151)
第二节 主要活动	(156)

第六章 报刊经营

第一节 经营方式	(159)
第二节 报刊发行	(162)
第三节 广告业务	(164)
第四节 报纸印刷	(164)

人物传记及简介

第一章 报 刊

第一节 官 报

河南官报

《河南官报》创刊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一月初五日，至宣统三年十二月间（1912年初），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停刊，历时7年多。创办人是河南巡抚陈夔龙（字筱石，贵阳人）。社址先在开封三圣庙门旧河台衙门内，后迁至抚院迤西路南。它是清末河南官报统治舆论的主要报刊。

辛丑条约后，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颁布“新政”，各省多已刊行官报，陈夔龙有鉴于此，乃命课吏馆会同布政司、学务处商议制定开办《河南官报》章程，并仿照陕西省的做法，于课吏馆内附设官报局司其事，由课吏馆主持出版。至宣统三年（1911年）六月，抚院借口改良《河南官报》，以设官报局专办费用浩繁等由，将其改由抚署统计处兼办，抚署发行。它原是五日刊，此后改为周报。

《河南官报》的宗旨是“宣上德、通下情，广见闻、开风气。”它先后开辟有圣训、谕旨、奏议、文牍、奏牍、本省纪闻、本省议案、宪批、省抄、各省纪闻、露电、论说、图表、译书、法制章程以及广告等栏目。为强调“宣上德”，《河南官报》将“圣训”、“谕旨”两栏目置于其它栏目之先，“圣训”的正文均以大字登载。从创刊到162期，每期都恭录“雍正朱批谕旨”；此后每期则以“宪庙朱谕”为主。奏议、文牍亦占据报纸相当多的篇幅，大都先本省后外省。

《河南官报》在其前期比较注意登载新闻，谓“新闻一类最足通达时务”，并且采取了“广搜罗”的若干具体措施。如和上海等处电报局商明，遇有要电新闻，随时从速电知；对本省新闻，则责成各州县由驿函报，半月一递；省城公牍，由各衙门、局、所文案随时摘要选出；中外各处报章，各购一份，以取精用宏等等。它登载的新闻内容，一是反映圣旨、奏折、宫中动向及本省要政；二是报道政治事件（如1905年留日学生反对日本《留学生取缔规则》的运动、1907年11月的商会党会党起事、同年4月河南清政府捕捉反清的李长胜等人）；三是反映各地经济、文化教育和风土人情等等。该报对于国外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的介绍和有关国内省内情况的报道等，对读者开阔眼界、启迪思想和增长知识，是起了有益作用的。

然而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河南官报》为适应清政府被迫宣布筹备立宪的新情况，进行所谓“改良”，把新闻部分几乎全部改为刊登清政府颁布的有关法令章程和河南奏牍、河南牍批、咨议局决议案等，以所谓立宪的欺骗宣传抵制革命思想的传播。

《河南官报》是册报形式，大32开本，一般为24面或32面。开始每期印刷数量为1800册，后增加到8000册。发行办法以派购为主（各州县按上、中、下三等，派购不同数量），零售次之。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起，在《河南官报》的封面上印有“大清邮政局特准立券之邮件”字样。

开封简报

《开封简报》是近代河南出版的最早的一家日报。它于1906年8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在开封创刊，1911年7月10日（宣统三年六月十五日）起改名《中州日报》，终刊于1912年3月18日。

这家日报是由河南学务公所的一些人员组织创办的，社址在该所的图书课内，属于政府官办性质的报纸。它主要刊载谕旨、本省新闻、各省新闻、各国新闻、杂志、院辕抄、藩辕抄、学务公牒、告白等内容，日出四开一张，油光纸单面印刷。宣统三年六月十一日，《开封简报》发表本馆特别广告说：“近奉学宪谕，以本报行销日广，特改称《中州日报》，内容加意扩充，力求完备，以副阅报者诸君雅意，并采登各署局所公牒章程，以期消息灵通，为宪政进行之补助，俾普通社会皆输入政治思想。前经拟定章程，由学台详请抚宪批准，照办在案。兹定于本月十五日起改良发行。”

改名《中州日报》后，报纸扩大了篇幅，日出两张。这期间，武昌起义爆发，各省响应，该报站在反对革命的立场，竭力维护苟延残喘的清王朝统治。如报道河南革命党张钟端领导的革命义举是“土匪勾结起事”，将英勇就义的十一烈士，诬称是“首要各犯”已“照军前办法处死”。

然而就新闻业务上讲，《开封简报》较当时河南其它各报却有三个明显进步：（1）它以日报的形式出现；（2）新闻比重较大，占报纸版面的三分之一以上；（3）由册报形式改为单张。改《中州日报》后又划分了版面，成为两张四版。

河南民报

1927年5月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西北军出潼关东进河南，6月间抵开封，任河南省政府主席。为加强宣传工作，省政府设置宣传处，并接收《新中州报》的印刷设备，于1927年7月1日创办了《河南民报》的前身——《河南民国日报》。出版一个月后，因为国民党清党及宁汉合流，暂时停刊。不久，便改名为《河南民报》继续出版。社址在开封行宫前街14号。

1928年李光恒任社长，报纸由初创时的四开四张改为四开两张。1929年徐鉴泉主持报社事务，报纸由小型改为对开一张，另加四开一张。报纸篇幅虽然扩大了，但内容仍显单调、贫乏。国内新闻主要靠剪取外省都市报纸的陈旧消息，本省新闻主要登载政府文告及一些投稿，报纸记者自己的专访稿件很少。

1930年4月，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时局动乱不已，《河南民报》社长屡经更迭，先后

有丁家光、段剑岷、简贯三、刘遵真等人充任。蒋介石嫡系将领刘峙任河南省主席后，仍以《河南民报》为省政府机关报，由方其道任社长，彭家荃任总编辑。1933年刘伯伦继任社长。此时，报社经费充裕，组织健全，印刷机器铅字等设备得以扩充，报社规模日益扩大。这一时期报社分设编辑、经理两部分，设总编辑、经理各一人。报纸四版：一版为国内新闻版，辟有评论栏；第二版为省市新闻版，辟有专载栏，多登通讯或特写；第三版为国际新闻版；第四版为副刊及广告。如增出附页，则多为专刊及广告。报纸发行依靠行政力量。省政府通令各厅处、各专区公署，各县府一律订阅。发行份数最高达到5000多份。报头为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题写，沿用多年直到停刊。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国民党政府迁到洛阳。《河南民报》除正常发行外，另出临时晚报，并在洛阳派驻专人采访消息。

1935年《河南民报》组织董事会，萧洒为董事长，刘德苏、方其道、张善舆、李汉珍、何佛情、杜俊六人为董事。刘伯伦仍为社长兼总编辑，谢锡福为总经理，殷元章为董事会书记。

1936年9月至12月，《河南民报》曾出过夜报，直到西安事变后，因白报纸及路运困难，为保持日报销路，只得将夜报停刊。这一年，《河南民报》改用新五号字，此乃本省第一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河南成为抗战前线。《河南民报》一面坚持在开封出版，一面将部分人员及印刷设备器材疏散到南阳，由殷元章主持出版八开小报。

1938年6月日军占领开封，河南省级机关迁往南阳镇平，1939年又由镇平迁洛阳，《河南民报》随同迁往洛阳，在东关建立新社址，日出对开报纸一大张。此时，报社董事会董事长由河南农工银行行长李汉珍担任，社长为张玉书，总编辑易继庄，实际负责为副总编辑贡一诚。

1942年，《河南民报》随省政府迁往鲁山。至1944年4月，日军大举进犯中原，洛阳沦陷，省政府又迁往内乡，以后又迁豫陕边境的朱阳关。这时，《河南民报》已不能维持正常出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同年9月《河南民报》由朱阳关迁回开封，仍在省府前街旧址恢复出版。此时，社长为田梦嘉。由于田还兼任省政府秘书长、省合作事业管理处处长，乃请副社长傅恒书代为主持社务。1947年，田梦嘉将社长一职让与其下属王文耕接任，直到1948年8月，这一时期报纸日出四开一张，分两版。第一版登载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社论或专载，第二版为省市新闻、副刊及广告。只发行1000份左右。《河南民报》最后一任社长为张了且，任职一个多月，开封就再次解放了。

《河南民报》是河南省内建国前出版时间最长，发行份数较多，社会影响也较大的一份报纸。尽管省政府主席不断变换，致使《河南民报》社长也更迭频繁，但《河南民报》作为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机关报的性质、地位却始终如一，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宣传报道内容有所不同。

1927年至1930年，冯玉祥主豫期间，开始执行的是国共合作的路线，《河南民报》主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他本人励精图治，提出建设新河南的十大施政纲领，实行了一些改革。《河南民报》对这些新措施，新政绩给予大力宣传和报道。随着宁汉合流，冯玉祥

参加反共,《河南民报》也开始宣传反共、“清党”。

1930年至1937年,内战时期,《河南民报》连篇累牍地宣传蒋介石“剿共”战争的胜利。“九一八”事变后,《河南民报》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刊登蒋介石的“敦睦邦交令”,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省市新闻报道的重点为省政府各厅处的工作,各专县重要官吏的任免,省市各种重大会议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政府迫于压力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此时《河南民报》的评论及新闻报道也以宣传抗日为中心,主要报道了东战场、北战场军事进展情况,报道官兵在抗击日寇中的英勇表现,对国民党军队的败绩措词含蓄,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战绩却只字不提。在省市新闻方面,着重报道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广大民众支援战争的活动,如踊跃捐献慰问前线将士等。报纸副刊设《抗战文选》登载有关抗战的文艺作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掀起反共高潮,《河南民报》曾将重庆政府关于“皖南事变”发表的文告,以特号字体标题刊登在头条位置,作了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报道。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人民要求和平,要求休养生息,此时,报纸论调比较平和。待旧政协破产,和谈破裂,蒋介石政府大打内战,《河南民报》在社论及评论字中积极鼓吹“戡乱救国”,号召人民“拥护政府”、“效忠政府”,宣称“戡乱关系国家民族前途,关系每一个国民的命运,所以每个人都应对戡乱大业作出贡献”,等等。对于战况的报道则处处掩饰国民党军队的败绩。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行宪国大”、总统选举、制定宪法等活动,《河南民报》也搞了不少欺骗性宣传。在地方新闻方面,《河南民报》竭力宣传省政府励精图治、振兴实业、发展教育等政绩。除此之外,《河南民报》还充当了省政府对国民党省党部进行党政磨擦的工具。

附:河南民报社组织大纲

第一条 本社设社长一人,承受董事会之委托负责处理全社社务。

第二条 本社分设编辑经理二部,分掌编辑经理各事宜。

第三条 编辑部设总编辑一人,受董事会之委托、社长之指导,指导全部事业之进行。

下分左列各科:

- 1、评论科 设撰述、特约撰述各若干人
- 2、时事科 设编辑若干人
- 3、经济科 设专门编辑若干人
- 4、教育科 设专门编辑若干人
- 5、体育科 设专门编辑若干人
- 6、艺术戏剧音乐科 设专门编辑若干人
- 7、电报科 设译电员、收报员、收音员各若干人
- 8、翻译科 设英、意、日、俄、德、法等国文字翻译员若干人
- 9、副刊科 设编辑若干人
- 10、采访科 设采访主任一人,外勤记者及通讯员若干人
- 11、校对科 设总校对一人,校对若干人

12、调查科 设剪报员、图书管理员、索引编制员若干人

13、星期增刊委员会 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

14、各科专门委员会 各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

各科应于全科职员之中，由总编辑指定负综理各该科事务之□如遇临时发生重大事件，得临时专设一委员会以处理之，编辑部职□之分配、增减，由总编辑视事务之繁简，商承社长决定之。遇事务甚简时，得令一人兼办数科事务。

第四条 经理部设总经理一人，受承董事会之委托、社长之指导，指挥全部事业之进行。下分左列各科：

1、稽核科 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

2、文书科 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司书若干人、收发员若干人

3、人事科 设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

4、会计科 设科长一人，会计员、出纳员、管款员各若干人

5、庶务科 设科长一人，庶务员若干人

6、广告科 设科长一人，广告员、广告招览员各若干人

7、发行科 设科长一人，发行员、推销员各若干人

8、印刷科 设科长一人，监工一人及工长工徒若干人

9、附业科 办理承印及出版各项附属业务，职员临时酌定。

经理部职员之分配增减由总经理视事务之简繁商承社长决定之，如遇事务甚简之时，得令一人兼办数科事务。

第五条 各部科如因临时发生事件，职员不敷分配时，得雇用临时职员。

第六条 编辑部各委员会委员由总编辑商承社长延聘各种专门人才担任之。

第七条 各部科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另定之。

第八条 社长得定期召集全社职员举行社务会议讨论全社应兴应革事宜，其最后决定之权仍属于社长。

第九条 总编辑得定期召集编辑会议研商各种改进事宜，其最后决定权仍属总编辑。

第十条 总经理得定期召集经理会议研商各种改进事宜，其最后决定权仍属总经理。

第十一条 本组织大纲由董事会核定后施行，遇有修改必要时，得随时提请董事会修改之。

——摘自河南民报十周年纪念刊

民国廿六年七月一日

第二节 党派报纸

一、同盟会、国民党、统一党报纸

《河南》杂志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日本东京出刊的《河南》杂志，是同盟会河南

支部（亦称河南分会）首次创办的机关刊物，它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版不久便风行海内外，为河南最早写下了资产阶级政党掌握报刊武器的历史。

在《河南》杂志出刊之前，河南留日学生曾以同乡会名义出版《豫报》。但因主持人成分复杂，常发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同盟会员发表革命言论感到不便。为此，同盟会河南支部决定创办《河南》。适逢河南革命女志士刘青霞（本姓马，系曾任广西、广东巡抚的安阳蒋村人马丕瑶之女，因嫁与尉氏刘耀德为妻，故改姓刘）旅日考察，出巨资两万元相助，使《河南》杂志得以迅速出刊。由张钟端（字毓厚）任总经理，刘积学（群士）任总编辑，其它主要工作人员有曾昭文、陈伯昂、李锦公（纲斋）等。

《河南》是一个政治性综合月刊，它的宗旨是“启迪民智，阐扬公理。”内含门类主要有：社说、政治、地理、历史、教育、军事、实业、新闻、时评、译丛、小说、文苑等。它与当时中国留学界其它革命刊物的共同特点，都是把宣传中国面临的严重民族危机作为主要内容之一，以反帝救亡为出发点。

《河南》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场和战斗风格。它旗帜鲜明地宣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和同盟会的纲领、主张，号召废除封建君主制度，建立平民的国家。它用极多的笔墨揭露清政府玩弄“预备立宪”的阴谋，同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在张钟端所撰写的《对于要求开设国会者之感喟》一文中，不仅透彻地说明在清王朝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不可能“开有人格的国会”，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叩头请愿的立宪派只不过是一些为自己“得一差役、就一馆事”的沽名誉、钓利禄之徒。《河南》直呼这些鼓吹立宪的绅士们“乃为巨奸”，是平民之公敌。《河南》的编撰者认为：不彻底揭露清政府“预备立宪”的骗局，不对立宪派进行坚决无情的批判，就谈不上有以后的革命胜利。它大声疾呼要打倒清朝政府“非诉之铁血不可”、“舍革命军而外更无它道……”。《河南》的这些宣传舆论，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河南》当年还取得了青年鲁迅的支持。当时，27岁的鲁迅正在东京，《河南》杂志由孙竹丹通过周作人而他取得了联系。于是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等都成为《河南》的撰稿人。鲁迅曾接连在《河南》杂志发表了五篇论文和一篇译述。在这些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历史和文学的文章中，向广大读者介绍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及其发展，宣传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了洋务派、改良派和复古派，阐明了摩罗诗派文学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战斗精神。这些文章在政治上配合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颇为《河南》增色。

《河南》杂志以其鲜明的立场和犀利的锋芒，成为自同盟会成立后在留学界以自省名义发行杂志而大放异彩者。它热情地鼓吹民族、民权主义，被誉为“足与民报相伯仲”。所以，创刊以来发行量日增，销售近万份（有半数发行到河南省）。同盟会河南支部于刊物创办后即派李锦公等人归国到开封，在刘青霞的资助下于西大街路北开设了“大河书社”销售《河南》杂志（1908年被清当局查封）。《河南》在豫省的发行，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于中州大地，起了极大的作用。

《河南》的革命锋芒尖锐异常，使当时的清政府十分恐慌，下令在国内严密查禁，还指示驻日公使勾结日本警事厅，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间封闭了《河南》杂志社，扣压了尚未发行的第十期杂志。总经理张钟端被拘留，并被清政府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在河南近代报刊史上，这是被反动当局查禁的第一个报刊。

附：《河南》杂志发表的鲁迅作品目录

- 一、《人间之历史》（1907年第一期，署名令飞）
- 二、《摩罗诗力说》（1907年第二、三期，署名令飞）
- 三、《科学史教篇》（1907年第五期，署名令飞）
- 四、《文化偏至论》（1908年第七期，署名迅行）
- 五、《裴彝飞诗论》（译述）（1908年第七期，署名令飞）
- 六、《破恶声论》（1908年第八期，署名迅行）

注：

①《人间之历史》在收入杂文集《坟》时，改题为《人之历史》。

②《破恶声论》，是一篇未完稿。

自由报

开封《自由报》创刊于1912年6月30日，是全国最早揭露袁世凯称帝阴谋的国民党报纸之一，于1913年1月29日被查封。它存在时间虽然很短，但在河南省内外有很大影响。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后，委派他的表弟、亲信张镇芳到河南任都督，对河南进行残暴统治。面对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黑暗社会现实，河南不少革命党人和各界人士从所谓共和成功的梦幻中纷纷惊醒，起来同袁世凯的假共和、真专制进行坚决的斗争。《自由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它在发刊前，于1912年5月在《大中民报》（同盟会河南支部机关报）上刊登《自由报出版公启》，署名发起人有曾昭文、刘基炎、陈芷屏、方贞等。是年9月1日，同盟会河南支部改组并成立了国民党河南支部，《自由报》遂成为它的机关报。总编辑贾英（侠飞），总经理陈芷屏。社址在开封老府门街路西。

《自由报》的宗旨是：“监督政治之改良，增进国民之知识，发挥自由之真髓”。它本着这个宗旨，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武器，指名道姓连续不断地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言词激烈异常。11月8日，发表《痛斥张镇芳之荒谬绝伦》一文，指斥张镇芳“违背约法，压抑民权，肆行专制，反对共和，仇恨舆论，罪大恶极”。1913年1月20日，又以《袁世凯弄巧成拙》为题著论指出：“乃袁氏以专制时代养成之人才，不娴于共和之政体，其一举一动，无不违背约法而为君主作为之变相。”

1913年1月23日，《自由报》登载编辑张凤九的评论文章《代表河南三千万同胞质问张镇芳》。张镇芳以文中有“杂种”二字为由，把《自由报》总编辑贾英捕至都督府羁押。贾英被捕后，《自由报》公开宣告坚持公论，死不屈服，并临时特加《自由剑》一栏，斥责张镇芳破坏言论出版自由，肆意捕人，摧残舆论的罪恶行径。28日又发表《张镇芳罪大恶极、破坏约法、摧残舆论、实行专制》的长篇社论。社论中说：“且尔张镇芳自莅任豫督以来……犹复藐视国会，贱弃议员，主张制定宪法由各都督起草，通电要求各省同意，其希望帝制之野心彰明较著”，揭露了张镇芳拥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该社论还坚决表示：“记者一息尚存，断不能任尔张镇芳为中华民国河南之专制皇帝！”《自由报》对反动当局这种藐视和抨击，表现出了当时革命党人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

张镇芳非法逮捕报社总编辑后，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又公然勒令《自由报》停止出刊。《自由报》发表特别启事，回答说，本报“决不敢稍自畏葸，听其专横野蛮”，表示对勒令不予理睬。张镇芳乃于1月29日派出军队悍然封闭了《自由报》社。

开封民立报

《开封民立报》创刊于1913年5月20日，是国民党河南支部正式创办的机关报。它是河南国民党人继开封《自由报》被封闭后，又竖起的一面斗争旗帜，然而，它只存在了两个多月，到7月14日就被袁世凯、张镇芳之辈扼杀。它是被河南反动当局摧毁的第二个国民党报刊。

1912年8月间，陈伯昂遵照孙中山的函示，到北京铁狮子胡同黄克强处，领到5000元党的活动经费后，就地订购了印刷机，回到开封立即着手筹办报纸。当时有凌樾、胡抱一协同办理。半年后，国民党河南支部的机关报《开封民立报》问世。编辑部设在理事厅街西头路南，经理部、印刷部设在路北。总编辑陈伯昂，总经理马静生，编辑主任罗飞生（亦作蜚声、非生，字锐青）。报纸日出对开两大张，内容分旨趣、命令、本社专电、省议会记事、评论、海外新闻、紧要新闻、本城新闻、本省新闻、译论、漫画、小说、文苑、广告等。此外，还特辟《民国春秋》专栏。报纸最初印刷2000份，后增至3000份，最多时发行到7000份。

《开封民立报》的宗旨是：“启发民智，采访民隐；发扬民主，坚定民心。”报纸出刊之日，国民党河南支部为其写祝词曰：“大报出版，声振中天，发挥公理，保障民权。”

该报继承《河南》杂志和《自由报》的战斗精神，以社论、专论、时评为武器，充分揭露和尖锐抨击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并刊登题为《欺弄蒙童，虚伪共和，实为帝制》的漫画，以唤醒河南人民为捍卫民主共和而斗争。它针对袁世凯背叛“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誓言和暗杀宋教仁、擅自借款、破坏责任内阁制等倒行逆施，著文愤怒声讨袁“口血未干，誓言遂背，自由杀人，自由借债，任意逮捕议员，任意摧残舆论，任意位置私人，任意断送国土，……迹前清专制昌炽之时，曾亦无此毒焰也。”断言袁窃位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暗无天日”。

《开封民立报》提倡发展民族经济，它发表的文章中主张：振兴产业不得不借债、输入外资。但这种借债和袁世凯的借债有着根本的区别：一个是活中国，一个是亡中国。文章还主张酌输外资与外人合办银行，但外资绝对不能超过于我；发展产业必先国营后民营，现实之急务是修铁路和采矿等等。

《开封民立报》坚持揭露和强烈抨击袁世凯的独裁专制，使袁氏及其在河南的代理人张镇芳极为恼火。张镇芳曾派人劝告总编辑陈伯昂“改变方针，对袁之攻击不可过于显露”。并威胁说：“如过于固执，恐有不利，到时追悔也来不及了。”不久，张镇芳又派人送去500元钱，作为“辅助报社的津贴”，忘图以威胁利诱迫使该报改变立场。但《开封民立报》不为所动，一如既往地把斗争矛头指向袁世凯及其反动统治。就在这时，7月1日夜发生了开封火药局爆炸事件，参加策划组织这一行动的《开封民立报》编辑敖瘦蝉、访员章培余被捕。张镇芳终于找到了扼杀《开封民立报》的借口，在7月14日查禁了该报出版，7月28日又派军警包围报社，逮捕、杀害了编辑主任罗飞声等工作人员，封闭了报馆。至此，